

理想之光永恒

1999年,也可以说是2000年,零点,漫天礼花拉开了新千年的帷幕,覆盖了我们每一个人朴素又华丽的梦想,我的儿童小说《上铺的兄弟》中的大小人物便是从这一时刻次第登场。一群跟随打工父母生活在北京城角落里的天赋异禀的流动儿童,被几个满怀理想的教育学家挑选出来,集合在城郊一处旧工房,开始了他们非同一般的成长历程。几年时光里,他们被教育,被鼓舞,被热心的企业家资助,破土向上,努力地冲向天际。

宿舍狭小,四人一间,面对面两张架子床,所以主人公邹亮才有了他的“上铺的兄弟”石磊。校园更小,教室、办公室、老师宿舍,无一例外地灰头土脸——歪斜的木门要用劲提起才能关上;缺失的窗玻璃由硬纸板临时充数;后墙漏雨,拿整卷塑料薄膜糊个严实;夜里躺在床上,能看见屋瓦间星星点点的天光。就连土操场上升国旗的简陋旗台,都是师生们动手拿捡来的砖石垒成。但是,纯真的孩子、发光的老师、动人的梦想,合力成就了一段教育奇迹。在我虚构出来的“北京市凌云实验学校”这个小而友善的集体当中,孩子们共享他们对世界的判断,调和彼此的心性喜好,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,终于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。

新千年伊始,正是中国城市建设迅速发展之时,从全国各地涌入城市的打工父母数以千万,他们抛家别舍,含辛茹苦,为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,创造了不起的发展奇迹。在那些长的日子里,跟随着他们身边的学龄儿童是如何长大的?这些孩子有很好的读书机会吗?被城市接纳和照顾了吗?很多年中,我一直在关注、打量和想象“民工子弟”这个庞大群体的生活。

10年前,我曾经写过一本《余宝的世界》。书中的余宝和他的两个姐姐,为家庭的困窘而愁眉苦脸,却始终不失善良、仗义和希望,他们的成长让我怜惜和欣慰。曾经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读者,在暑假某个滂沱大雨的黄昏,读到书中人物为了挣钱买两张3D电影票而被倒塌的砖墙砸中时,书中情节和现实场景交融,这个敏感和善良的孩子忍不住嚎啕大哭,边哭边给他的长辈打电话,哽咽嘱咐说:“你们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啊。”这个孩子和“余宝”们也许一辈子不会发生交集,但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彼此沟通、彼此认知的通道,那就是“心灵”。童稚的心灵,清洁的心灵,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,也是我一直愿意为孩子写作的原因。

回到这本《上铺的兄弟》。当老师的都有爱才之心,他们一心一意把这群聪明的孩子挑选出来,试图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因材施教的环境,让孩子不浪费天分,最后能够超越父辈,走向一个更理想更广阔的天地。这不是一个童话般完美的故事,但因为这个故事在新千年的漫天礼花中开头了,有了延展起伏,有了一双双大手小手的接力,主人公邹亮和他上铺兄弟一生的命运轨迹,被强有力地改变了。纯真而又满怀理想的老师们,做出那样勇敢的大事,这是教育在精神层面的成功。愿理想之光永恒,愿教育工作者荣光永恒。

来源:人民日报



书房记

“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大诗人陆游自题于“书巢”的这副名联,让文人骚客们艳羡了800余年。能拥有一间清静的墨香四溢的书房,晴窗万卷,笑看流年,这是多少书虫朝思暮想、魂牵梦萦的神仙世界啊!然而,正像梁实秋先生所说的,书房,尽管是一个非常典雅的名词,但在旧时,惟“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”吧!贫寒的学子,即使没有穷至囊萤凿壁的地步,书房,通常亦只是不曾奢望的一个幻梦罢了。

愚生也晚,虽是红旗下的新社会,但恰值20世纪70年代,故土田园的贫瘠并不容我有丝毫的关于书房的念想。那些年,自家的两间土坯草房里,光线昏暗,墙体斑驳,除了两张木床,便是破烂的农具,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生活用品。林则徐所谓“家少楼台无地起,案余灯火有天知”是也。我和弟妹们看书写作业,总是依赖一条狭长的板凳,在门前的大树下你推我挤地完成。若逢着阴雨天气,便只能弓腰撅腚地趴在屋内床上“鬼画符”一番了。其时,家中也根本没什么书看,床头枕下,偶尔倒能翻出一本半旧的《毛主席语录》来,那是爹娘的时代记忆了,像现在的孩子自小爱看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格林童话》等翻译作品,抑或皮皮鲁、马小跳以及各种文图并茂的精美绘本之类,更是闻所未闻,梦中也无。既无书,又谈不上爱读书,哪里又想得到什么书房呢。

我到省城读中专时,仿若毫无理由,忽然就对书着了迷,读而上瘾,整日里手不释卷。之所以有书可读,有闲得读,实因学校有一幢4层高的图书楼,楼内藏书无数,而其时我们的课程也并不太紧张,且吃住皆在校舍。我那时对随园主人提出的“书非借不能读”这一观点委实是“顶礼膜拜”——一来囊中羞涩,无钱买书;二来亦无须购阅,图书馆便是我这书虫的超级“书房”。所以,中专4年,书梦未曾休,书房梦却难得做一回。亦可说,那样的青春岁月里,书于我,重在读,而非藏,或曰拥有。我甚至自视颇高,觉得唯有图书馆才是一本本著作典籍的最好归宿,而不是被私人所独占独享。

毕业那年,我被分配到老家工作。先是栖身于集体宿舍,人多物杂,生活烦乱,偶尔躺在单人床上翻翻书,疲了,倦了,便随手撂在一边,并无珍藏之心。书,大多还是借来的,有单位的,也有小城图书馆的。借而读,读而还,来有影,去无痕。当然,偶逢手头宽裕了,或于书店看中了一本心仪已久、偏偏图书馆又难寻的书,我亦会毫不犹豫地乐购而返。天长日久,竟也积了不少,因居室大家共用,无处摆放,所以东一本,西一本,床角,枕畔,餐桌上,鞋盒里……书影散乱,举目可见。

那时,我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写作的练习。但室内仅有的一张桌子,上面常常粘了饭米粒,泛着啤酒沫,有时甚至还躺着两双臭袜子。加上同室兄弟们兴趣不一,工余闲暇还要用它打牌、下棋来调剂生活,故而即使我灵感突至,欲捉管为文,常常亦是草草收场。慢慢地,我在心底也就萌生了独居一室,可以自由读书、恣意写作的渴望。或者

说,书房即卧房,卧房亦是厨房,三合一倒无所谓,总之得“离群索居”。然而,当时单位的境况不好,兄弟们也都自谋出路,我也交了一纸辞呈,转身下了江南。走时,宿舍里已是狼藉满目,那些年购的书,我也只是随身带了痴爱难舍的几本,其余的,只能忍痛换作远行的盘缠了。书房于我,依然遥不可及。

白乐天云: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……”我的故乡,却在千里之外。日里梦里,我漂荡无依,若随风青萍。有幸的是,一个江南女孩偏偏相中了喜欢读书写字的我,给了我一个家。房子虽是租来的,且仅有两间,但已足够。情郁于心的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恣肆“倾泻”的缺口,在3年的时间里,不仅潜心凝虑地研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典籍,还顺利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,找到了新工作,并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郑板桥曾笑吟: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。”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。窗外虽非帘幕重重,阑干几曲,屋内却也报刊遍地,奇书满床。小小书房“锁不住午夜书声”,承载了、容纳了我太多的荣辱悲欢,催我奋进,教我自省,甚至,使我从根本上忘记了它是租赁而来。

后来,女儿出世了,我们也挥别了租房岁月,搬进了新家。新家三室一厅,明净敞亮,我的书房梦,也终于变成了现实——无事此静坐,有情且赋诗。那些跟随我辗转多年、不离不弃的书卷文集,亦终于有了一个脚踏实地。我家的书房绝大部分图书皆是我从旧书店、旧书摊百般挑选细心搜罗来的,抑或是网购的经典版本。环视书房,固然少了精装成套、名目铿锵的贵族气派,然而,我已经知足了。我本是普通乡村教师,三尺讲台,两袖清风,平凡淳朴即是生命的底色。而我喜欢的书,亦是与我脾性相投、惺惺相惜的吧。素日余暇,读书与写作,既是工作需要,亦是业余嗜好;既为闲情逸致,亦为精神追求。我所憧憬并享受的,是“直当花院里,书斋望晓开”的人生乐趣,是陆放翁“读书有味身忘老,病经书卷作良医”的从容入世。故而书房的装潢是否考究,书籍的新旧与多寡,皆无关乎人生的忧乐嗔悲,亦非与人显摆的道具玩物。

我家的书房至今未曾命名。常来常往的文明诗友偶或戏谑:你好歹也算是个读书爱好者,每每还练练书法,搞搞创作,这书房怎能不起个雅名别号呢?我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之。想那刘禹锡安贫乐道于“陋室”,袁子才潇洒行乐在“随园”,梁启超挥毫泼墨“饮冰室”,周作人随笔杂说“苦茶庵”……书房名皆如雷贯耳,振聋发聩。然我辈籍籍无名,半生庸碌,在这物价飞涨、房贷压身的年月,能有个读书看报、舞文弄墨的地方,已是幸事矣!此刻,我端坐于书房电脑前敲打这篇拙文,心中却也禁不住暗忖:果真要附庸风雅起个名字,那权且叫“偷闲斋”吧——想江湖险恶,世路难行,若能偷得浮生一刻闲,远避纷争,暂别是非,心无旁骛地读几页书,写几行字,且笑且歌,随心随性,这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美事?思至此,不觉莞尔。

来源:青年作家报